

2001. 3

(总第九十一辑)



要
目

- 西藏和平解放的琐忆
- 献身于祖国的化工事业
- 我的追求
- 天津的民间艺术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91辑·2001年第3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10
ISBN 7-201-03918-0

I. 天... II. 中... III. 文史资料-天津市
IV. 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54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

*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字数:150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6.00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1·3(总第91辑)



- 西藏和平解放的琐忆 郝广福(1)
跟随张经武同志进藏的日子 郝广福(21)



- 大沽船坞的一百二十年 盛志刚(33)
天津三条石最早的机器铁工厂郭天成 杜少川(48)
一台珍贵的印刷机 王玉柱(58)
旧天津英商先农公司 金彭育(63)



- 我的良师益友——李麦 李凤池(71)
《天津日报》初创时期回忆 邹 仆(82)
日军攻占天津记事 潘纳禄作 张桂敏译(90)



献身于祖国的化工事业	余国琮(98)
我的追求	叶嘉莹(108)
记声乐教育家吕水深	曹悦孙(132)



心系祖国	杨庆华(147)
永远有一颗中国心	廖永武 孟宪玲(153)
郑光煌的人生之路	廖永武 林 旭(163)



天津的民间艺术	王者师(174)
封面照片说明	(32)

西藏和平解放的 琐忆



郝广福

编者按：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50 年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标志着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我们选编了两篇有关西藏和平解放历史的三亲史料，以飨读者。

1951 年 5 月 23 日，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原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揭开了西藏历史新的一页——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西藏获得了解放。

时间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是那种山高路远，道路不通，运输困难，物资缺乏，供给跟不上，许多进藏的战士因饥饿劳累而病倒、受伤，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情形依然萦绕于脑际，难以忘怀。

《协议》签订之前，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向国际社会呼吁干预西藏的同时，调重兵云集金沙江畔……千方百计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妄图使西藏从祖国分离出去。昌都战役失败后，他们才派代表团来北京谈判，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人民解放军进入了西藏。

但是这些分裂主义分子并不甘心失败，趁我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后，尚未站稳脚跟，人民群众对我党的政策不理解之机，大肆煽动群众闹事，断绝我军的粮草供给，企图以此把我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

我人民解放军发扬英勇善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粉碎了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以后的西藏改革奠定了基础。

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为了不忘记历史，在今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之际，根据我在西藏工作时期的回忆，参考有关资料汇集成文，供学习、研究和和平解放西藏这段历史的人们参考。

一、环境与形势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不久，我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同志的机要秘书兼译电员，随张经武同志进驻西藏。后又因工作关系我从前藏经后藏来到阿里，翻过喜马拉雅山，走过岗底斯山，爬过昆仑山等许多大山、名川，了解了藏族的一些民俗民情。在这个 120 万平方公里的神奇土地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主要是山多，中国的许多大山几乎都在西藏境内。山高路远，空气稀薄。不管从西康、新疆，还是从青海、云南进入西藏，都要翻山越岭，行程几千里。这样的恶劣环境给兵员的调动，物资的运输造成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其次是寺庙多，这似乎成为西藏的一大特色。当时有的藏军藏在寺庙里，消灭藏军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寺庙不能有任何损坏，解放军确实做到了既消灭藏军，又保护了寺庙，为此牺牲了不少同志。

那时西藏的形势十分紧迫。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席卷全国，中国大陆只剩下西藏没有解放，此时西藏当局内的一些亲帝国主义的分子，进一步加紧了勾结帝国主义的活动。制造了把西藏的一切汉人都赶出西藏的“排汉事件”；向联合国派人、写信呼吁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插手西藏问题，妄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在这种形势下，我新华社于1949年9月2日，发表了题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势力吞并中国领土》的社论，表明了我国人民坚决反对西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插手西藏的决心。同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长篇社论，进一步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解放西藏的能力和决心。毛主席亲自审阅了这些社论，果断批示：“宜早不宜迟。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战略地位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随后解放西藏问题就列入了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

二、任务交给十八军

中央决定把解放西藏和管理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西北局给予协助。工作的方针是“争取和平解放，立足于武力解放”。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人民解放军都必须进入西藏，保卫国防，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鉴于入藏道路的艰险，形势紧迫，中央要求进藏的准备工作的包括军力部署、人员调配、后勤保证、思想转弯等从1950年1月初开始到4月中旬必须全部到位。

西南局把解放西藏的主要任务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并要求迅速占领康定，以此为基础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接境地区。

当西南局接到解放西藏任务之后，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他 15 岁参加革命，在江西中央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中浴血奋战，三次负伤，中央军委授予三等红星奖章。长征途中一直担任一军团政治巡视团主任和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运西军分区政委、黄河支队政委、湘西军区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政委，晋冀鲁豫军区一纵队、七纵队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1948 年后豫皖苏军区升为大军区，张国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后任十八军军长。在 20 多年的军队生涯中，参加和指挥战斗百余次，屡建战功，特别在淮海战役中，时任豫皖苏大军区副司令员张国华，奉命率部进行宿怀狙击战，经五天急行军和七昼夜激战，终于和兄弟部队一起抵挡住了国民党李延年兵团三个军的多次猛攻，对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维兵团起了重要作用。张国华的军事指挥才能多次受到刘、邓首长的赞扬。当西南局决定由张国华率部进军西藏的报告上报中央时，毛主席高兴地批准了这个报告。

三、思想转变

十八军担任主力解放西藏的消息宣布后，许多干部、战士都没有想到，当时十八军正在川西。川西这个地方即使在冬季也是草木青青，田舍依依。部队正向鱼米之乡的川南大平原行进，此时上级已确定由十八军接管川南。张国华已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十八军政委谭冠三被任命为自贡市委书记，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也担任了泸州市军管会主任。十八军的大批干部也已分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职务。

西藏在绝大多数人的脑子里是落后、荒凉、空气稀薄、雪峰冰川林立的地方。当时十八军的干部战士由于连年征战，有许多人在婚姻家庭方面存在一些实际问题，这次准备在川南给予解决。因此

要求他们马上开赴西藏，很自然的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因此有的人就认为“去西藏什么都完了，连写封家信都不容易”。有的战士说：“十八军过去吃苦最多，这次又叫十八军去西藏不公平。”“西藏人烟稀少，是个不毛之地，让我们去干什么？”“西藏、西藏，一辈子老婆娶不上。”

为此，十八军的领导把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他们认为思想问题不解决，思想弯子转不过来，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军党委召开会议做出决定：讲形势、讲任务、讲中央、毛主席对十八军的信任。党员、干部要先解决思想问题，要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张国华、谭冠三等领导同志首先向西南局、向党中央、毛主席表态：“坚决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他们在全军干部动员大会上说：“党把进军西藏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赖，是十八军的光荣。”谭冠三要求“共产党员要以坚强的党性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即使死在西藏，埋在西藏，也在所不辞。处处青山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呢！”大会之后，一级抓一级，层层做思想工作，军领导下到连队，一个一个的解决思想问题。

针对有的同志说“上级不公平”，张国华同志说：“过去我们协助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要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这是多么光荣神圣的使命啊！西藏过去没有党的组织，现在由我们去那里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不是更值得自豪，更值得光荣么！”当有同志说西藏是“不毛之地”时，他说：“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是帝国主义不嫌他荒凉，长期以来，往那里钻。现在美帝也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领土还不如帝国主义热心？一省不保，四省不安。如果西藏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疆就要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不会安稳了。”

说到婚姻问题时张国华说：“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西藏姑娘结婚，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200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金成公主

和西藏王结了婚，现在我们到了西藏当然也是可以和藏族姑娘结婚的。”他还说：“对于已经结了婚的，爱人暂时留在川西。我们进藏之后，还是让她们留在后方好好地学习和工作，等我们到西藏站稳脚跟后，再把她们接去。”

军领导的苦口婆心，在干部、战士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纷纷表决心“坚决打到西藏去，解放那里的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1950年3月4日至7日，十八军召开全军庆功祝捷、进军誓师大会，138名特等功臣受到表彰，他们纷纷表示，要在解放西藏中再立新功。张国华军长带领全军将士向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宣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完成进藏任务，誓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谭政委也再三表示：“如果这次到边疆，我真的为祖国捐躯了，请你们一定把我的骨头埋在西藏。”

四、全国支援

十八军进藏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关注，纷纷表示“你们进军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从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西北等全国各地运来了各种专门为进藏部队制做的皮衣、皮裤、皮鞋、皮帽、皮手套、雨衣、帐篷，特制的代食粉、旦黄蜡、饼干、干菜和各种肉类罐头以及固体燃料、防风镜和防滑鞋绊等等。大家高兴地说：“过去都说国民党嫡系部队装备好，但和我们比差得太远啦。”

十八军挑选了14000名优秀战士，补充了大批强壮骡马和便于携带的各式武器，全军面貌焕然一新。中央从苏联新购进的30架高空运输机，停在四川新津机场准备进藏。西南军区抽调了汽车、辎重、工兵共十三个团队和大批民工，赶修从雅安到甘孜的公路，冒着雨雪架设了上百座桥梁。全国人民的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十八军官兵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高昂士气，掀起了大练兵运动。他们在川西平原的城市、村镇和公路、田间小道上，负重行军，

疾步奔走，有的战士腿上绑着沙袋，肩上扛着石头，昼夜苦练。许多人脚磨起了血泡，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因为他们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肩负着祖国人民的期望，肩负着解放西藏的重大历史使命。

五、两项重要举措

解放西藏的军事准备一切就绪，只等中央下命令，部队即可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境，解放昌都，挺进拉萨。但是中央没有这样做，而是公开声明，希望达赖派人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但遗憾的是达赖没有回应。于是中央又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即两次派人亲到拉萨说明我党关于解放西藏的政策和民族政策。我党派格达活佛去西藏后，西藏当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将格达活佛杀害于昌都。

格达是西康人，甘孜一寺庙的活佛。1902 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拉萨学了八年佛经，获得佛教最高学位——格西，后回西康白利寺做主持。

格达与我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我党秋毫无犯的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有感触地说：“视我博巴人（藏族）为兄弟惟共产党和红军矣。”规模不大的白利寺一次就拿出青稞 150 多担，支援处在极度困难的红军。在他的带领下，甘孜等地区的各族同胞开始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不久在朱总司令主持下，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被选为这个政府的副主席，他与朱德、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红军北上后，在甘孜一带留下 3000 多名伤员，格达活佛组织群众多方保护，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军队的残害。当时格达活佛还亲自编写了 40 多首歌曲抒发对红军的想念之情。

1949 年西康省还没有解放，格达活佛就秘密派出代表，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致意。西康解放后，

格达活佛在甘孜召开了 3000 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庆解放，并派代表带上实物和亲笔信跋涉几百里来到康定欢迎解放军。他的经堂有三件保存完好的珍贵物品，一张“山西八路军”奋战图，一张朱德的照片，还有用一块木板遮掩着一张布告，上面写着：

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为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
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总司令官陈昌浩

公历 1936 年×月×日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格达活佛任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时全国政协也致电邀请他去北京开会，他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我非常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可是目前西藏尚未解放，我怎么能去北京呢，我想先去西藏，向拉萨三大寺以及西藏地方政府里的朋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去说服他们回到祖国怀抱。等到西藏和平解放了，我再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此，格达活佛再次请求、恳切希望毛主席、朱总司令同意他去西藏。

当时我军也考虑到格达入藏风险很大，不但要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周旋，还要提防外国人的暗算，劝他途中多加小心。格达活佛非常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地方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此时他入藏形势极为有利。经过研究党中央同意格达活佛去西藏劝和，行前西南局有关领导向格达活佛介绍了我党对西藏和平解放的十项政策。

1950 年 7 月 4 日格达活佛一行肩负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由甘孜出发，踏上了前往拉萨的征途。他沿途不辞劳苦，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经过二十多天的行程，于 7 月 24 日到达昌都。当时昌都尚未解放，格达活佛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宣传解放军进驻甘孜以后，如何遵守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爱护藏族群众。

西藏地方政府得知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很快将西进前往拉萨的消息后，非常害怕。随向昌都边使下令“不准格达西进，也不准返回甘孜，限制格达在昌都的自由”。1950年8月22日西藏的反动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分子，丧心病狂地将格达活佛害死于昌都。

驻在甘孜的我军得知格达活佛被害的消息后，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献上这样一副挽联：

为真理，身披袈裟入险境，纵出师未捷身先亡，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沙，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

张经武同志在拉萨时经常用格达活佛献身西藏解放事业的感人事迹，教育我们，让我们向他好好学习。

在格达活佛昂然西行的同时，经党中央批准，西北局、西北军区也组成一个劝和代表团赴拉萨，其任务亦是劝说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代表同中央进行商谈，以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该团共有八名成员，其中四名代表是青海各寺庙的活佛。劝和代表团的团长是青海塔尔寺的当才活佛土登居美诺布，此人是达赖喇嘛的长兄，代表西藏亲英分子和贵族的利益。他去西藏的途中千方百计把代表团的情报提前告诉西藏当局。劝说代表团中只有迟玉锐和程广惠两同志是受中央有关部门派遣，赴藏执行劝说西藏当局到北京和谈任务的。

迟玉锐同志是老共产党员、西北局机关干部，在劝和代表团中担任秘书。他随身携带一部小型电台，随时和西北局、党中央进行联系。程广惠是共产党员、机要员，迟玉锐同志的妻子、西北局机关干部，负责翻译电报、保管文件。另外还有报务员李明同志，藏语翻译汪永德同志，他们受迟玉锐同志领导。

劝和代表团于1950年7月从西宁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西藏境内的黑河（即现在的那曲）。

当西藏当局得知该团人员的组成和有关情况后，遂决定将代

表团的四名代表亦即四个活佛接到拉萨，而把迟玉锐、程广惠等四同志困在黑河，并没收了他们携带的电台和自卫手枪。40天之后又决定把他们四人送往山南与不丹交界的山区——野人沟，让猛兽把他们吃掉。他们在途中得知昌都已获解放。此时西藏当局害怕西藏解放后共产党找他们算账，遂又把他们四人押解到了山南地区的乃东县软禁起来。后来他们四人辗转来到拉萨。张经武同志抵拉萨后，迟玉锐同志向张代表汇报了他们在途中的遭遇和西藏地方政府对我党的顽固态度。西藏当局扣押和谈人员，没收其电台、手枪的作法，再一次表明了他们拒绝与我党和谈的态度。

六、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

格达活佛被害，青海劝和代表团我党人员遭软禁于黑河和乃东县，可谓西藏当局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的途径，关闭了和谈的大门。尽管如此，在昌都战役前夕，即9月上旬也就是离昌都战役不足一个月的时候，我党再次给西藏当局最后一个机会，要他们派代表团于9月上旬来北京谈判，否则我军将进驻昌都。

西藏当局不仅对此却置若罔闻，而且拼命地扩军备战，把藏军十一个代本(团)中的八个代本调往金沙江西岸，企图以金沙江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为屏障，在长达近千华里的南北线上部署兵力，阻挠我军西进。因此昌都这场战役是不可避免的了。

昌都是西藏的东大门，进军西藏必须解放昌都。因此昌都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昌都地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这里地形复杂，原始森林一望无际，深不可测，山高缺氧，河流湍急，所有这些为我进军西藏，解放昌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藏军的重兵把守。我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克服了重重困难，与藏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0年9月20日我军向战区开进，到10月初完成了战役部署。北起青海的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

柯、德格、巴安，南至云南的德钦沿金沙江东岸，我军对昌都地区的藏军形成了蹄形包围圈，直接参战兵力达两万人。

10月6日我军发起昌都战役，19日昌都解放，24日战斗胜利结束。布置在昌都地区的藏军几乎全部被消灭。

七、和平谈判的焦点

昌都战役的消息传到拉萨后，西藏当局一片混乱，主张与解放军打仗的人少了。正当混乱之际，阿沛·阿旺晋美从两千多华里的昌都派人送信到拉萨，来信再次阐明了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要求噶厦（即藏政府）速派和谈代表进京，并保证在协议达成之前不进军拉萨，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侵犯。于是在昌都战役结束后不久，西藏当局即作出派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的决定。代表团于1951年1月初起程，4月到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了和平谈判。

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换句话说，没有昌都战役就不会有和谈的这一天。

参加谈判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有：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代表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有：首席代表噶伦（藏政府高级官员的职务）阿沛·阿旺晋美，藏军总司令索安旺堆，秘书长土丹旦达，四品官土登列门、桑增顿珠。

在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中，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成了谈判的焦点。谈判一开始，西藏代表团就顽固地坚持不同意解放军进藏。当中央代表团全面阐明我军进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地方需要强大的国防军驻守，以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保护西藏人民安全等重要意义之后，他们又提出了解放军何时进藏、进去的人数、驻守在

什么地方等等，中央代表团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具体而详尽的答复。而后他们又提出西藏是个穷地方，解放军进藏，西藏负担不起。中央代表团说，解放军进藏由中央来负担，不要西藏人民负担。至此，他们没有再提出疑义。

西藏代表团遂向西藏地方政府请示，但得到的回答是仍不同意解放军进藏驻守边疆。西藏当局甚至还提出“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把藏军改编为共产党的部队，派守在边防上，汉人的军队还是不能来”。西藏当局决心要阻止解放军进藏。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代表团内部展开了争论，讨论的结果代表们认为既然承认“西藏不是独立的，这么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了”，于是西藏和谈代表们接受了“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这一条款，遂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简称《十七条协议》。

八、《协议》签订后的斗争

《协议》签订后，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工作人员从四面八方进入西藏。

首先到达拉萨的是中央代表张经武及其随行人员，即十八军办公室主任阿乐、藏语翻译彭措扎西、机要秘书郝广福、警卫员李永珂，他们一行5人经香港、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于1951年8月8日抵拉萨。随后是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先遣队，于7月25日从昌都出发，翻越6900米高的丹达山等高山，徒步行程1100多公里，于同年9月9日抵拉萨。再后是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部于7月1日从甘孜出发，经昌都徒步行军1600多公里，克服了山高缺氧等险恶的自然环境，通过数百里无人区，于同年10月26日抵拉萨。番号为十八军的青海独立支队由中共西北西藏